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美] 邓尔麟 著 蓝 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美)邓尔麟 著

蓝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北京

DK38/02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据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年版翻译

中文版经美国耶鲁大学授权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违者必纠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5-321 号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美)邓尔麟著

蓝桦 译

责任编辑:罗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 1202 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5.125 印张 129 千字

印数 0001—1000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683-5/K.102 定价:9.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八十憶雙親

錢穆

前言

金乃一孤兒

年十二父先逝

世

余尚童蒙

無知

越二

十年

先母棄養

余時隻身在成都

未能親視殮葬

因

難方殷

而未訖告父

孫弟祭之禮

僅閉門啜泣深夜

噙咽而止

年七十一

值雙親百齡冥壽

時余游學馬來亞之

吉隆坡

特思撰文

略述梗概

在耳末果

今歲余年及十

又值雙親一百十歲之冥壽

因見我親梨山

沿橫貫公路

月花運返台北

途中深留一月

此又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

回念前塵

感懷萬端

而自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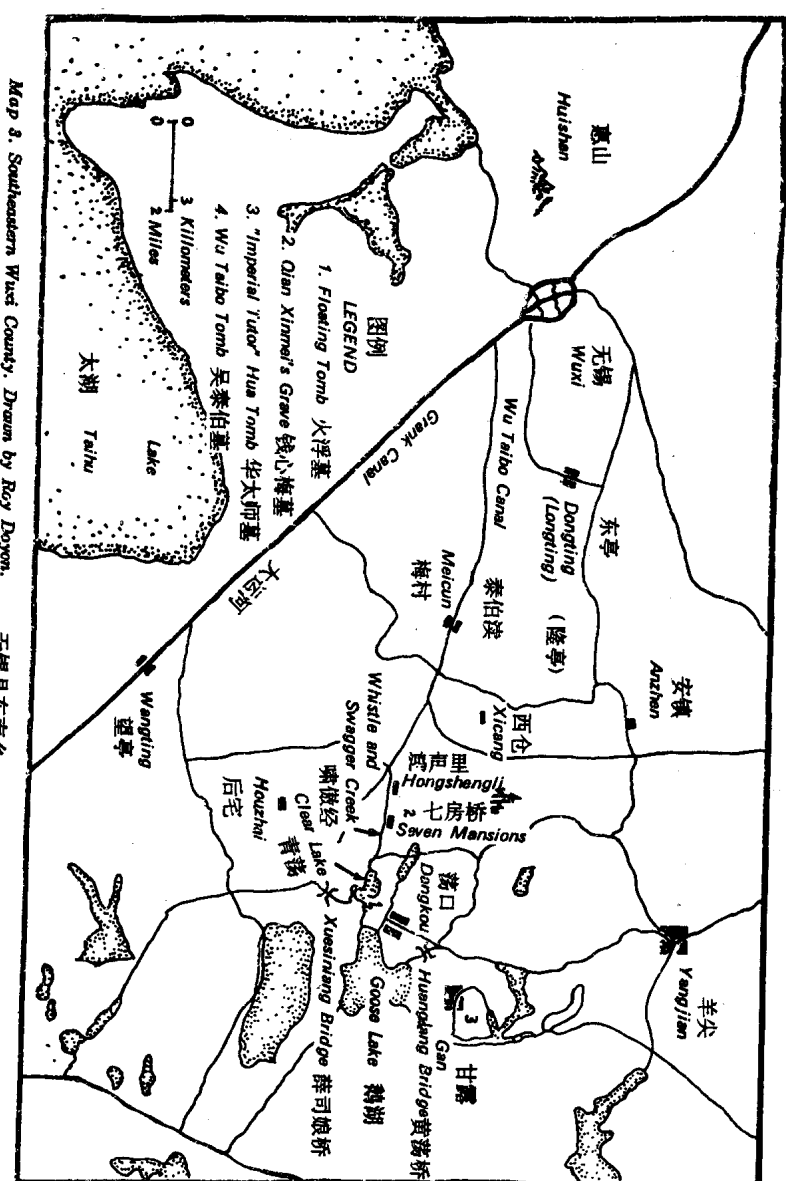
精神衰退

自念此生

命月

素書樓稿紙

錢穆先生手跡



Map 8. Southeastern Wuxi County. Drawn by Roy Dozon.

无锡市东南乡

译者前言

1990年钱穆先生在台湾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国学大师，台湾《历史月刊》出版专刊。我应邀翻译了《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的第三章“水乡”。之后，我接受了翻译全书的工作；前后花了四年多时间，才得以完成。《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作为一本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从多元(中西)和多层次(雅俗)文化的观念出发，描述剖析了中国一个旧日乡镇的天地，却反映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翻译过程中，我再一次受到这种中国精神的洗礼，并得到生动的“跨文化”教育。作为译者，我为有此机会深感荣幸。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曾获美国新英格兰历史协会大奖，其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在写作上的创新。具体地说，就是作者在评介钱穆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思想以及描绘七房桥世界时，运用了采访以及实地考察的方式，并直接采用了钱穆本人的回忆录。在语言风格上，作者既运用了通常的学术术语，也采用了抒情性的描述。因此，我在翻译中注意运用了两者的结合。同时，在翻译过程中，我在注意到对原作的“忠实性”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中文的“可读性”。作者把大量中文资料译成英文，并针对西方读者进行了加工；同样，我在把英文翻回到中文时，也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读书习惯，在得到作者同意之后，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剪裁和改动。再者，为了便于国内学者查阅，我们决定留用英文注解和书目。

翻译是一种不尽人意的艺术，往往也是不讨好的苦役——也许永远只可能是一种过程，而不能称之为成品。幸运的是，我在翻译和修改的过程中，曾有机会与作者邓尔麟教授(Jerry Dennerline)进行多次讨论切磋。邓先生是我在麻省安姆赫斯特大学

(Amherst College)的同事和友人,十分熟谙中国语文和文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从儒家学说谈到老庄思想,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谈到邹容的“革命军”,从昔日的七房桥谈到今日中国的改革,在一起回顾温习、重新认识了中国历史。我们对每章每节、甚至不少字句进行了反复的斟酌磋商。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如何翻译“national unity”。因为“national”同时具有“国家的”和“人民的”两个概念,我们想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团结”和“人民团结”;但最后我们确定了“国民团结”,认为它最能表达钱穆先生和作者本人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本译稿是我与作者的合作。在此,我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英文版译出;我和作者对他们的编辑部慷慨同意我们翻译出版深表谢意。另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刘东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本书在钱穆先生百龄之年出版是不可能的。限于水平和时间,本译稿仍有不少缺点和不足,谨请读者原谅并指正。

蓝梓 1995 年 7 月 2 日于美国麻省安城

中文版序

1980年冬，我在耶鲁大学任教之时，余英时教授馈赠钱穆先生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我原本只想把它作为研究无锡地方史的参考资料；然而，阅毕思索数星期后，我悟会到这本回忆录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后来，余教授帮我联系在1983年去台湾访问了钱穆先生，得以聆教。1985年和1986年我两次去江苏无锡县进行实地调查，加深了我对《八十忆双亲》中七房桥世界的了解。《八十忆双亲》描述栩栩如生，富有地方色彩，颂扬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价值，有着强大的感召力。钱穆先生深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如同爱父母，同时他痛切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民中日见淡薄。我之所以把《八十忆双亲》翻译成英文，就是希望能把钱穆先生的情感和精神介绍给西方读者，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尚浅，感受仍淡，对本世纪以来它在中国的失落无所体会。我希望我对“七房桥世界”的研究能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也能从中体会到我阅读思索后的心得感受。在拙作英文版序中，我曾表达了一个愿望：今日世界正致力于寻求普遍真理，我愿为此作出贡献。诚然，钱穆先生所信奉的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对钱穆先生所崇尚的文化以及他在该文化中的经历和地位缺乏了解，因而必须以自己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去理解他的“真理”。这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用一种文化和语言来解释某些新真理，而又能使它们被另一种文化的语言所接受”。

如果翻译是这种跨文化理解的必要媒介，那么现在将拙作《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译成中文也许不失为一件益事。它将能帮助中国

读者了解《八十忆双亲》对一个研究无锡地方史的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不断地变化,人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随着世代的更新而变化。钱穆先生于1990年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当今中国读者中有辛亥革命的经历者为数甚少,对昔日七房桥世界熟谙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无人会否认钱穆先生所热爱的中国文化以及该文化对他们本身的影响。也无人会否认本世纪以来新文化排斥旧传统在中国所造成的影响。钱穆先生所提出的有关新与旧和东西方的问题至今有着现实意义。我希望拙作中译本以及引起我深思的《八十忆双亲》原文能激发中国新一代读者对中国传统进一步的认识和热情。

拙作对七房桥的描述和对钱穆先生回忆录的摘用应由我本人负责。但是,在著书过程中,我颇受益于诸位同仁师友。这本书的出版实为众人之劳。象钱穆这一代前辈在艰难困苦中仍能自爱不折,自强不息,深受我等众人的敬仰。我们共同的意愿是希望能在对人类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上得以沟通,达到共识。本书中文译者蓝桦先生也同此愿望。在翻译过程中我和他曾多次切磋,相互讨论,并就中国读者的情况在中文版中作了少量修正。他的工作不仅是将英文译成了中文,而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将原书中的意图化成了中国境界,沟通了东西方的思想交流。正由于此种共同的努力,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大家能在探索普遍真理的过程中达到互相的认同和理解。

在整个写书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组织机构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向余英时、许倬云、李弘祺和吕作燮教授以及台湾、无锡两地的各单位机构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ellowship progra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s, The Miner Crary Fellowship at Amherst College, 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以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研究和写作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台湾无锡同乡会,香

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南京大学, 无锡市, 无锡县和荡口, 鸿声里, 甘露, 安镇, 梅村各乡政府, 无锡市图书馆, 无锡轻工业学院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提供的方便和支持。最后, 我要感谢在美国的许多同事和朋友, 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在海外的无锡各界人士。由于他们的大力协助, 本书才得以写就。此致敬意, 并请指教。

邓尔麟 写于 1995 年 6 月 18 日

(蓝桦 译于 1995 年 6 月 24 日)

英文版序

如何用一种文化的语言来阐明另一种文化中所谓的真理，而且不改模走样，乃是当今世界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无论这两种文化的属性是科学性的或是大众性的，政治性的或是知识性的，东方的或是西方的，你的或是我的，人们总难摆脱一个如何去理解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的真理标准，使它既带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又能被各自视独立的社团所接受？这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用一种文化的语言来解释这些新“真理”，而且使它们能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

本书正是此种尝试，试图来解释为什么钱穆先生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能笃信某些真理并且毕生致力于传播这些真理。从早年起，钱穆先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如对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由西方政治、经济扩张强加在身的。可是钱穆与一些倾向西方启蒙并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同，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他坚持不懈地发扬振兴中国的传统价值。钱穆的“对立面”既不是文化的过去，也并非“现代的”今天；被钱穆认为与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乃是西方文化所颂扬的真理标准。

不难理解，西方人士往往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及其追随者为创立新真理标准而作出的奋斗，而他们的奋斗并不仅是为了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然而，像钱穆那样能看到传统价值与现代问题之间关联的知识分子也同样为此作出了努力。他们并不一味地依恋传统，而是在深思反省之后，看到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能使中国文化独树一帜而不同于西方文化。

就钱穆而言，在他教学实践中，他看到传统文化价值能在政治和经济大变动中仍然得到传播，从而巩固加深了他对这些价值的信仰和理解。我希望能通过一种对比来解释钱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信仰和理解，即把他在回忆录中对文化传播的看法和我对当时环境的再认识相对照。

事实上，本书所描述的有两个七房桥。一个是钱穆本人的，是他多年来思索反省的结果。这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中有所记载。这个七房桥的世界与钱穆所希望传播的价值是不可分隔的。第二个七房桥世界是我对历史的一个重建。它基于从报纸，家史，碑帖，宗谱等文件中取得的证实，也基于实地考察，采访和社会调查。这个七房桥的世界是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钱穆家乡研究的产物。也许，它只是我个人主观的，然而我希望它同样带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性。如果这一想法也适用于钱穆本人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可能达到第三个七房桥世界：一个重要的有共同点的源泉，一个真正的七房桥世界。

在本书中我力图让钱穆先生直抒己见。在对待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的关系的态度上，钱穆那一代人被分成几派，而钱穆则被认为是“文化保守派”。他与当时学术界西方化了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学术思想被认为是宋明理学派，对当代新儒家有很大的影响。他曾与反共反苏人士有所交往，而被封为反共人士。然而，钱穆的一生言行都证明了对他戴帽贴标签之荒唐。钱穆基本上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产儿。他生长在中国社会最动乱的年代，然而他也经历了那个文化中最丰富多彩的生活。我想重建的正是钱穆的这种经历，而不是他本人的思想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形成。如果本书要强调一个观点的话，那就是我将考虑到那种重建与有关中国文化延续性的广泛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希望能以一种超越其文化本身的语言来理解它。

邓尔麟

目 录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	(1)
英文版序	(4)
第一章 初访素书楼	(1)
第二章 “学而时习之”	(10)
第三章 水乡	(54)
第四章 《八十忆双亲》	(87)
第五章 重访素书楼	(107)
注解(英文)	(120)
参考书目(英文)	(138)

第一章 初访素书楼

在台北北面丘陵窄谷的边缘有一座小小的高等学府，那就是从内地迁来的东吴大学（英文称为苏州大学——译者）。从学校大门往下走几百步，有一条乡间小路。路旁一个公共汽车站，有站牌标明了地名。1983年7月下旬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作为一个西方的历史学者，跳下了咔嚓作响的公共汽车来到此地，为的是寻找一个标明“素书楼”的红门住宅。中国学者文人向来认为住宅书斋是神圣的。他们所起的斋名雅号往往不仅怪僻奇异，通常也点出主人的性格志向。“素书楼”就是这么一个别致的名字。“素书楼”本是主人钱穆先生当年老家的堂号，出自何典故，今已难查考。钱氏祖上在长江下游鱼米之乡无锡县的七房桥居住。1911年钱穆在家乡大病一场，幸得母亲精心照料得以康复。为了纪念母亲和家乡，他就把在东吴大学的住宅命名为“素书楼”。

素书楼旁有一条小路，从现代化的大学校园直通山坡另一边的村庄。我站在小楼的红门前，揣摩着素书楼这个名字。它的主人历史学家钱穆先生1895年在无锡七房桥出生。那一年，新兴的日本用武力从衰败的清朝政府手中夺取了台湾。这一奇耻大辱使得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对中国传统的看法并投身于革命洪流。虽然无锡七房桥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但同样受其影响。七房桥离无锡县四个小时的水路，离苏州仅两个半小时。昔日的苏州是一个乡绅文化的中心。革命思潮曾通过乡村学校的年轻教师 and 在上海苏州等地的亲友传到七房桥。钱穆先生所受的教育就具有此种革命思潮的性质。我来到素书楼也正是为了寻求对此种革命精神的了解。（注1）

我所要了解的并非是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史实，而是想知道中国的过去在钱穆这样的老一辈史学家脑海中意味着什么。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钱穆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意识到中国文化遗产的伟大。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文明和最大帝国的发祥地。她有着伟大的发明创造和优秀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世纪时，西方超过了中国。钱穆这一代中很多人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背弃了中国人民。无论中国统治者曾是多么骄傲或是中国文化价值有多么深刻，历史并没有能证实这一点；与此同时，世界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途径。在摒弃过去传统的同时，中国的革命者并不为面对西方和赶上他们现在所理解的历史而操心；他们的决心是要在此过程中寻得新的价值。从19世纪90年代的反清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到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们统统都自认为是在为抛弃自身的历史包袱而奋斗。他们所追求的是赶上或者超过所谓现代世界的先进思潮。

但是对于钱穆以及其他脱离了革命的人来说，历史的作用并非那么清楚。1976年毛泽东去世，80年代中国加速改革。自那以来，人们又开始重新寻求历史传统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重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让人们感到：他所犯的错误是由历史所决定的。他在1949年进城后拒听忠谏是重犯了历代帝王君主的错误。另一方面，改革已经恢复了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无论是乡村迅速发展的集体工业经济还是自由发展的小农家庭经济，都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当年曾告诫人们，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会改变社会主义的历史航道。但邓小平则认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在当前放松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气氛下，家庭观念与历史古迹和文物一起重新得到承认，孔子再次受到尊敬，佛教也有所复苏，仿佛历史又在重现。历史学家们又从故纸堆里找出过去历史的正面影响，把它们与负面影响相提并论。总之，在中国为其未来感到游移不定的时候，人们都在用一种革命后的批判眼光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求新的联系。

当然，重新探索中国历史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恰恰相反，研究历史必得研究历史的变迁。中国的变化已从革命转到革命后的改革，这时仅仅用革命思想已不再能说明中国的变化。虽然改革已引起人们认为现状可以改变的广泛热情，但仍须依靠人们对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由来和去向的了解。光靠革命的理想而没有对历史的广阔、纵深的了解并不能对改革提供支持。当我来到素书楼时，以上种种想法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想对钱穆先生那一代人的精神有所了解。他们那一代人最先设想了一个摆脱了独裁和外国统治的中国。他们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而且仍意识到与中国历史传统的有机联系。我带着这些问题和想法来采访钱穆先生。

作为有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 30 年代是北京大学一位颇受尊敬的教授。他所写的历史巨著影响深远。他创立的新亚书院是香港第一所中文大学。1949 年以后，钱穆成为了海外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正如 20 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钱穆年轻时曾追求过革命。但又不同于许多人，钱穆不能使他的革命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美与怪有着同样深切的爱。作为历史学家，钱穆力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当今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作为教育家，他力图给年轻的一代灌输历史的价值观念，因为他认为后者是处在空白之中。我们中间许多人年轻浅薄，也许会轻率地指出钱穆的论点中的错误并认为这些论点是历史循环论和感情用事。然而，我们无法否认钱穆先生为探索历史意义所作出的努力和提出的真知灼见。事实上，中国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问题并非截然不同。钱穆正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自钱穆萌发革命思想到今天我来到素书楼的红门前，70 年的岁月已经逝去。我见到的是一位带着眼镜，身材矮小的学者。我期望的是他能给我带来另一时间和空间的精神。钱穆先生一生坎坷沧桑：他经历了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后人们的幻灭和企图以科学和民主改变中国价值观念的新文化运动；他看到了 1927 年在国民

党领导下中国的重新统一和激进的学生运动；他也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最终，他在香港和台湾长期过着流亡生活。他先后失去两个妻子，如今又双目失明。然而，在我于1981年初次读到的《八十忆双亲》里，钱穆先生表达了一种已然超脱了往日年代中的怀疑和冲突的特殊的思想激情、精神和世界观。

虽然有些人谴责钱穆这种超然的精神并参与政治争论，但钱穆始终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他与诗人学者闻一多的悲剧性交往就能说明他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信仰。钱穆对闻氏的学问十分钦佩，在抗战期间曾与他短暂同住。闻一多后来却写文章斥责钱穆丧失灵魂，因为钱穆拒绝指责国民党镇压学潮。但是对此攻击，钱穆不加理会。1946年闻一多因公开谴责国民党暗杀其友人而在昆明惨遭刺杀后，钱穆却前往凭吊。钱穆认为闻一多的学术成就是中国文化的丰碑，而他的死乃是乱世的象征，表明了周期性的文化兴衰正处于低谷（注2）。

可是另有人认为，闻一多之死是旧文化和新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象征。此前不久，闻氏刚从不问政治的态度转变过来。他对钱穆的批评与激进派的声音相吻合，但当时他们与歌颂旧文化价值的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和谐的。然而，到了20和30年代，激进派的观点越来越占上风。他们说的是充满新词汇的新语言，写的是大学校园里通行的白话，与旧文化的节奏越来越不合拍。他们所提倡的是政治责任、科技进步、社会主义、反抗侵略以及民权和革命。这些激进的主张当然只能用新的语言、新的节奏来表达。要做到在追求新主张的同时又遵循旧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如家庭，师道，气节，避政，中庸等，在太平盛世也许是可能的，但是，时值乱世只能使人们的观念混乱，心态分裂。

闻一多曾写过优美的白话新诗，发表过对古典诗歌的评论文章。早年就学于纽约和芝加哥艺术学院。虽然他曾拥护过国民党，可是回北京之后他立誓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然而，在1944年当他看到一些年轻的壮丁披镣带铐、长途行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